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

——基于地理信息数据的实证考察

黄振乾

【内容提要】 外来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西方国家塑造并长期主导着全球援助体系,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援助格局。作者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以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为例,将援助项目位置与非洲民众对政府绩效评价数据进行匹配,使用"候选名单控制设计"对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包括安慰剂检验在内的多种方式确证结果有稳健性。研究表明中国援助有效提升了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同时期的西方援助对提升非洲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则无明显作用。中国援助项目可能通过推动受援国经济增长和提振民众发展信心两个渠道提升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作者揭示了中国援助如何在治国理政维度增强受援国的政府能力,进而推动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这与西方援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展上乏善可陈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发现是对中国援助的"新殖民主义"叙事的有力反驳。中国未来应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援助与国际发展合作体系改革。

【关键词】 中国对外援助;绩效合法性;中非关系;国际发展;地理信息数据

【作者简介】 黄振乾,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北京 邮编:100083)。

【中图分类号】 D815 F1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2)03-0030-29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援助对非洲国家政策选择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1CZZ040)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效分享减贫经验的模式与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180)的阶段性成果。部分内容曾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生论坛""第十三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工作坊"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科研工作交流会"展示。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一 问题的提出

21 世纪初“走出去”战略和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使中国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首选对象。① 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业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不见硝烟的战场”。② 中国援助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广泛影响也使其成为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一方面,西方援助国家批评中国不遵循西方主导的援助范式,认为中国援助破坏了基于西方经验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另一方面,中国援助往往成为唯一能与西方援助“分庭抗礼”的对象。③ 学界、政界和媒体关于中国援助的争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中国援助能否推动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的生成。但既有研究对上述重要问题并未达成共识,相关观点也缺乏系统性的学术支撑。本文聚焦中国援助与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这一核心问题,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援助实践的理论框架,引入新数据和分析方法,从中国援助项目和受援国绩效合法性的角度,尝试回答中国援助与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关系及其影响路径,并比较中西援助对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差异。

对中国援助和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关系进行科学研究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有关援助的研究尚不能与中国援助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相匹配,中国援助的实证研究与国外相比也明显不足。④ 中国学者对援助的研究依

---

① 据统计,出席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非洲领导人规模几近同月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两倍。参见“Twice as Many African Presidents Made It to China's Africa Summit than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https://qz.com/africa/1414004/more-african-presidents-went-to-chinas-africa-forum-than-un-general-assembly,访问时间:2021 年 10 月 1 日。

② 《大疫情背景下的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在 2021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讲话全文》,http://www.cidca.gov.cn/2021-12/25/c_1211501472.htm,访问时间:2021 年 11 月 1 日。

③ 有西方学者将中国援助与旨在控制和攫取受援国资源的“新殖民主义”相联系,参见 Moisés Naím, “Rogue Aid,” *Foreign Policy*, No.159, 2007, pp.95-96; Daniel Wagner, “China and Neocolonialism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Policy Digest*, February 18, 2019。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将中国援助视为“龙的礼物”,参见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Axel Dreher, et al., “Aid, China,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Vol.13, No.2, 2021, pp.135-174。中国援助对当地的积极影响,可参见黄振乾:《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坦桑尼亚为个案的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8 期,第 127—153 页;徐志成、张宇:《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载《经济学(季刊)》,2021 年第 5 期,第 1499—1519 页。

④ 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国际关系领域。笔者考察了 2000—2020 年中国 16 本社会科学代表性学术刊物关于对外援助论文的发表情况,共 85 篇,其中国际关系领域 58 篇,占比为 68.2%;政治学(不包括国际关系)、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分别为 5 篇、4 篇和 2 篇。这 16 本杂志分别为《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贸易问题》《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公共行政评论》《政治学研究》和《公共管理评论》。

然由文件解读、政策描述和简单案例分析所主导。与此同时,使用地理信息数据分析中国对外援助已成为近几年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新的学术增长点。① 本文吸收中国援助研究的前沿进展,利用最新的地理信息数据(geocoded data)和因果识别方法系统分析援助项目对受援国绩效合法性的影响。② 分析表明,中国援助弥补了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赤字",西方援助不仅无此积极作用甚至可能削弱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三点意义:首先,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指出中国将自身发展经验和国际发展目标相结合的独特援助模式对受援国绩效合法性的影响同传统西方带有政治经济附加条件的援助范式存在根本性差别。这是中国援助而非西方援助能够提升受援国绩效合法性的深层次原因所在。其次,本文突破了传统援助有效性研究理论框架,采用受援国民众的主观认知偏好来评估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这种以普通民众为视角的援助有效性分析路径改进并丰富了援助有效性理论。最后,本文引入新方法以克服援助研究中因果关系识别面临的问题,从微观层面系统检验了中国援助项目与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 中国援助与绩效合法性

中国的对外援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但直到 21 世纪援助规模才出现大幅增加。③ 21 世纪至今的中国对外援助尚无系统的官方数据。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最

---

① "援助数据(AidData)"2018 年公布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的地理信息数据改变了中国援助研究缺乏可靠数据的现状。参见 Richard Bluhm, et al., "AidData's Geocoded Global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Version 1.0.1," https://www.aiddata.org/data/geocoded-chinese-global-official-finance-dataset,访问时间:2021 年 10 月 1 日。使用地理信息数据分析中国对外援助的相关代表性研究参见 Ann-Sofie Isaksson, "Chinese Aid and Local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4, No.4, 2020, pp.833-852; Ann-Sofie Isaksson and Andreas Kotsadam, "Chinese Aid and Local Corrup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159, 2018, pp.146-159; Ann-Sofie Isaksson and Andreas Kotsadam, "Racing to the Bottom?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Trade Union Involvement i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Vol.106, 2018, pp.284-298; Axel Dreher, et al., "Aid, China,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 pp.135-174。

② 在本文考察的 85 篇与对外援助有关的中文论文中,仅有 2 篇论文使用了该数据集。参见刘爱兰等:《中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吗?来自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对比的经验证据》,载《国际贸易问题》,2018 年第 3 期,第 163—173 页;黄振乾:《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坦桑尼亚为个案的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8 期,第 127—153 页。

③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援助的综合性总结参见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总结参见周弘主编:《中国援外 6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新数据,中国 2013—2018 年对外援助总量为 2702 亿元人民币。① 但根据相关研究机构估算,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从 2000 年开始迅速增加,总体规模与世界银行援助相当(如图 1)。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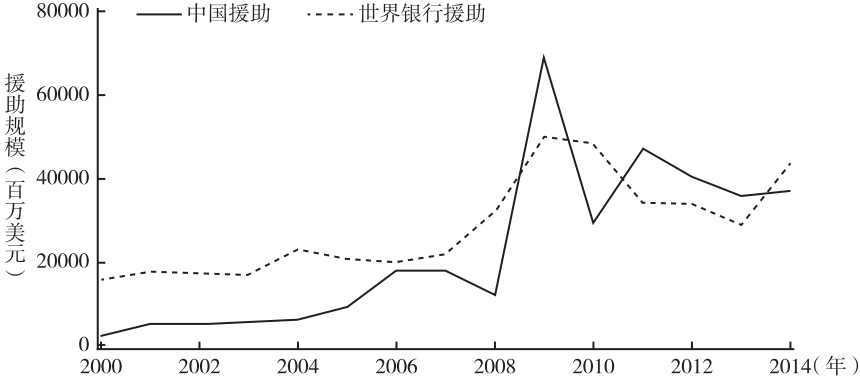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14 年中国与世界银行援助规模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制作。参见 Richard Bluhm, et al., "AidData's Geocoded Global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Version 1.0.1," https://www.aiddata.org/data/geocoded-chinese-global-official-finance-dataset,访问时间:2021 年 10 月 1 日;Alexandra O. Zeitz, "Emulate or Differentiate?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Competition, and World Bank Infrastructure Funding,"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16, Issue 2, 2020, pp.256-292。

中国政府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4 年发布了《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白皮书的主要功能是阐述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和理念并提供部分对外援助信息。2021 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是中国对外援助领域的一个新变化,它取代了《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并首次将国际发展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③ 有国

① 2702 亿元人民币的对外援助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项。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② 数据来源为"援助数据"估算值,由于该数据集中国援助项目资金实际支付(disbursement)缺失值较多,此处采用援助项目协议额(commitment)。为方便比较,世界银行援助项目也为项目协议额。此处数据包括"援助数据"中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ODA-like)、其他官方援助项目(OOF-like)和难以判断援助动机的模糊性官方援助项目(vague official finance)三种类别。下文会在数据介绍部分具体阐释该数据的特点和可能存在的缺陷。不同的数据集对中国援助的规模有不同的判断,有关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另一份评估可参见 Naohiro Kitano and Yukinori Harada, "Estimating China's Foreign Aid 2001-2013: Estimating China's Foreign Ai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28, No.7, 2016, pp.1050-1074。

③ 三本中国政府发布的白皮书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际媒体甚至将《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解读为“中国领导全球发展的宣言”。① 但无论如何,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不断增加、援助范围持续扩大、援助影响日益增强已是不争的事实。理解中国对外援助和受援国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从认识中国援助的动机、特征和影响着手。正是中国对外援助的特性使得中国援助和受援国政府绩效合法性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可能。

(一)中国援助的动机、特征和影响

目前学界对中国援助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援助动机、特征和影响方面。首先,在援助动机方面,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援助受到“革命外交”和冷战背景双重影响。② 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援助,有学者发现其不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偏好性,主要取决于受援国的经济、市场和能源储量。③ 也有研究发现中国援助并非针对非洲的资源,同西方援助一样会考虑到商业利益和政治社会风险。④ 从空间上看,中国援助项目在非洲的选址倾向于靠近受援国的首都和相对发达地区,避开边缘族群地区,而受该国资源分布的影响不显著。⑤

其次,一些学者着重分析中国援助的独特性,将中国对外援助同西方援助区分开来。国际关系研究者和经济学家都指出认识中国的援助需要“超越发展援助”。⑥ 西方国家援助是“有条件的(conditional)”,中国则奉行“不干涉内政”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也有研究从新兴援助国的特征来分析中国对外援助模式。⑦ 有学者

---

① Zhang Hong, “China's Manifesto for Leadership in Global Development,” https://pandapawdragonclaw.blog/2021/02/08/chinas-manifesto-for-leadership-in-global-development/,访问时间:2021 年 10 月 25 日。

② 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0—1978》,华东师范大学 2014 年博士学位论文;蒋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载《外交评论》,2016 年第 5 期,第 81—108 页;蒋华杰:《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载《外交评论》,2019 年第 6 期,第 121—154 页。

③ 董艳、樊此君:《援助会促进投资吗?基于中国对非洲援助及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载《国际贸易问题》,2016 年第 3 期,第 59—69 页。

④ Axel Dreher and Andreas Fuchs, “Rogue Ai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Aid Alloc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48, No.3, 2015, pp.988-1023; John F. Copper, *China's Foreign Aid and Investment Diplomacy, Volume I: Nature, Scope, and Origin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141-169.

⑤ 黄振乾:《中国援助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对 21 世纪中国援非项目的空间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9 期,第 102—127 页。也有研究发现非洲在任领导人的故乡得到更多中国援助项目,参见 Axel Dreher, et al., “African Lead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China's Foreign Assista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140, 2019, pp.44-71。

⑥ 林毅夫、王燕著,宋琛译:《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Jiang Lu, *Beyond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hines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African Agriculture*,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⑦ 庞珣:《新兴援助国的“兴”与“新”——垂直范式与水平范式的实证比较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5 期,第 31—54 页。

指出中国援助模式是一种区别于现有西方发展援助的“平行经验转移”或将中非发展合作理解为一种“共同演化的实用主义”路径。① 外国学者也承认中国援助模式与现有国际援助体系存在差异,他们将中国援助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援助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的援助项目不仅有发展目的也附带经济动因。②

最后,中国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是学界和政界最为关心的问题。一方面,不少研究发现中国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如对非援助不仅有助于非洲工业化,还有“点亮非洲”的作用。③ 中国援助项目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经济获得感,有助于受援国的农业发展、技术水平提高和吸收外来投资。④ 中国援助还对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减少当地经济不平等、改善基础设施、抑制社会冲突和促进就业等有积极作用,⑤并提升中国的海外形象和软实力。⑥ 此外,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援助可能也会对当地产生意外性的后果。⑦

(二)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

外来援助和受援国绩效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它是援助有

---

① 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11 期,第 117—135 页;Tang Xiaoyang, *Coevolutionary Pragmatism: Approaches and Impacts of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② Deborah Brautigam, “Ai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Meet the OECD-DAC Aid Regim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23, No.5, 2011, pp.752-764.

③ 徐丽鹤、吴万吉、孙楚仁:《谁的援助更有利于非洲工业发展?中国还是美国》,载《世界经济》,2020 年第 11 期,第 3—27 页;徐志成、张宇:《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载《经济学(季刊)》,2021 年第 5 期,第 1499—1519 页。

④ 唐晓阳:《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演变及其效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5 期,第 55—69 页。

⑤ 参见 Axel Dreher, et al., “Aid, China,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 pp.135-174; Richard Bluhm, et al., “Connective Financing: Chin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the Diffus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AidData at William & Mary, 2020; Shiqi Guo and Haicheng Jiang, “Chinese Aid and Local Employment in Africa,” SSRN Scholarly Paper, Rochest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2020;杨攻研、刘洪钟、范琳琳:《援以止战——国际援助与国内武装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1 期,第 129—156 页;李嘉楠、龙小宁、姜琪:《援助与冲突——基于中国对外援助的证据》,载《经济学(季刊)》,2021 年第 4 期,第 1123—1146 页。

⑥ 贺嵬嵬:《非洲孔院对中国形象的影响研究》,第十四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中国援助理论与实证创新工作坊”会议论文,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21 年 7 月 5 日;蔡洁:《中国对外援助与软实力提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为例》,第十四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中国援助理论与实证创新工作坊”会议论文,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21 年 7 月 5 日。

⑦ 参见 Samuel Brazys, Johan A. Elkink and Gina Kelly, “Bad Neighbors? How Co-Located Chinese and World Bank Development Projects Impact Local Corruption in Tanzan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12, No.2, 2017, pp.227-253; Ann-Sofie Isaksson and Andreas Kotsadam, “Chinese Aid and Local Corruption,” pp.146-159; Ann-Sofie Isaksson, “Chinese Aid and Local Ethnic Identification,” pp.833-852。

效性研究中应纳入考量的重要问题。绩效合法性从理论上可以追溯到统治合法性概念。① 本文使用的绩效合法性指的是一国民众对政府经济发展绩效的认可度,也可理解为民众对政府领导经济、管理经济和发展经济的能力与绩效的评价。② 如果政府治国有道,国家经济发展较好,民众福利有显著提升,则政府绩效合法性更高;如果政府治国无方,经济领导力弱,国家经济陷入泥潭,民众福利难以改善甚至恶化,则政府绩效合法性更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众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政府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成效,中国政府也由此拥有极高的绩效合法性。③ 如果中国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国内的地区层面)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提升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众福利,当地民众会更愿意将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体福利的提升归功于政府合理有效的政策与领导,进而给予政府更多支持。换言之,中国援助项目通过积极的项目效果,有可能最终提升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如图2)。外来援助能够提升受援国绩效合法性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寻求与中国交往与合作,并渴望获得更多的中国援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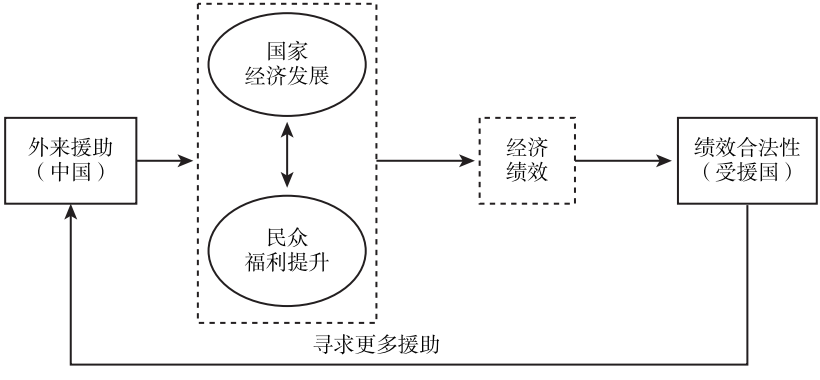

图2　外来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的理论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实线表示因果关系方向,虚线表示中间过程。

① 社会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可以追溯至马克斯·韦伯对统治合法性来源的相关论述,韦伯将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分为传统型权威、克里斯马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三种。参见 Max Weber, *Max Weber's Complete Writings on Academic and Political Vocations*, New York: Algora Publishing, 2008, pp.155-207。

② 对绩效合法性概念较为深入的讨论,参见 Yang Hongxing and Zhao Dingxin, "Performance Legitimacy, State Autonomy a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4, No.91, 2015, pp.64-82。

③ Yang Hongxing and Zhao Dingxin, "Performance Legitimacy, State Autonomy a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pp.64-82.

既有文献鲜有讨论中国援助和非洲国家绩效合法性的关系。本文认为,从理论上理解中国援助与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关联性,需要从中国援助本身的独特性入手,特别是中国援助项目区别于传统西方援助的独特性所在,剖析中国对外援助模式及其可能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带来的微妙影响。

一方面,中国援助被视为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国际示范,这种示范可以帮助当地政府制定和出台更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国际发展研究领域的学者提出"西方对中国对外援助感兴趣的背后是假设中国的发展模式也会自然反映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上。因为西方的发展援助在实践层面处处都体现了其自身的政治逻辑,而中国的援助也自然会体现中国发展的政治社会逻辑"。① 国际发展的示范性预示着中国对外援助自始至终都与中国自身发展经历结合在一起,它是中国国内发展模式在海外的延伸,是中国经验的国际表达。② 此外,中国对外援助体现了较为鲜明的国家意志,在国内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外援助的特征也有差异。③ 中国将发展经验通过援助项目嵌入非洲当地的发展过程,并通过援助专家传播到非洲生产实践中。中国在对外援助中注重分享自身的发展经验,项目和专家都通过政府严格筛选,援助专家被视为"国家使者"。④

中国的发展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经验产生了卓越的经济发展绩效,如果这种经验能够通过援助项目示范,最终在当地实现发展的创造性转化,则对当地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和经济绩效有积极作用。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包括对华援助也附着援助国的发展经验与理念。⑤ 同为受到过殖民侵略的国家,中国发展的艰难探索和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经济腾飞经验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调查显示,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最适合非洲发展的经济模式的支持率达到 22%,仅次

① 李小云等:《新发展的示范——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微观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 页。

② Li Xiaoyun, et al., "Difference or Indifference: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Unpacked," *IDS Bulletin*, Vol.45, No.4, 2014, pp.22-35.

③ 如 1950—1970 年,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国营的农场、纺织公司、糖厂和化肥厂,这与当时中国的国有化发展经验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特别是 21 世纪初"走出去"战略实施后,中国援助更加侧重技术转移、经验分享和发展的专业知识。

④ 以农业援助为例,截止到 2016 年,中国已在非洲建立 26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上千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参见陆继霞、李小云:《中国援非农技专家角色分析——以中国援非农技组派遣项目为例》,载《外交评论》,2017 年第 4 期,第 85—104 页。

⑤ 周弘等:《外援在中国》(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 页。

于对美国模式的支持率33%。① 不少非洲国家还学习中国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模式，有学者甚至将非洲的特别经济区称为“非洲的深圳”。②

另一方面，中国援助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急需的领域，可以帮助当地政府达到更好的经济发展绩效。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在发展中国家极受欢迎，西方援助国也开始学习中国的援助模式。③ “非洲晴雨表”调查表明，非洲大部分民众（63%）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是积极的，超过一半（56%）的非洲民众认为中国的发展援助更能满足非洲国家当前发展的需要。④ 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对非援助，有学者发现中国援助比美国援助对非洲工业发展有更积极的影响，原因在于中非之间的技术差距与美非相比更为适度。⑤ 经合组织国家的发展援助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民主政治、改善治理、增加透明和提高人权等并非发展中国家急需的领域。在项目具体实施上，西方的援助项目操作过程复杂冗长，有相当一部分是援助中介机构和援助专家的花费，没有直接惠及当地民众。⑥ 此外，从援助发展历史来看，西方对外援助往往还与输出国家制度和政治价值相联系，援助有时是建立盟友、传播意识形态或惩罚对手的外交工具。⑦

（三）对援助有效性测量的改进

深入理解外来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之间的关系需要对现有援助有效性框架进行反思。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主导的援助有效性研究相信援助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认为在政策环境良好的国家，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积极的。⑧ 另一

---

① Josephine Appiah-Nyamekye Sanny and Edem Selormey, “Africans Welcome China’s Influence but Maintain Democratic Aspirations,” https://afrobarometer.org/publications/ad488-africans-welcome-chinas-influence-maintain-democratic-aspirations，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0日。

② Deborah Brautigam and Tang Xiaoyang, “African Shenzhen: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49, No.1, 2011, pp.27-54.

③ Alexandra O. Zeitz, “Emulate or Differentiate?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Competition, and World Bank Infrastructure Funding,” pp.256-292.

④ Mogopodi Lekorwe, et al., “China’s Growing Presence in Africa Wins Largely Positive Popular Reviews,”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publications/ad122-chinas-growing-presence-africa-wins-largely-positive-popular-reviews，访问时间：2021年5月1日。

⑤ 徐丽鹤、吴万吉、孙楚仁：《谁的援助更有利于非洲工业发展？中国还是美国》，载《世界经济》，2020年第11期，第3—27页。

⑥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⑦ Maurits van der Veen, *Ideas, Interests and Foreign Ai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Hans J. Morgenthau,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6, No.2, 1962, pp.301-309.

⑧ Craig Burnside and David Dollar, “Aid, Policies,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4, 2000, pp.847-868.

些研究表明援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甚至西方发展援助可能造成受援国的经济依赖和依附,影响其长期经济发展。①

传统对援助有效性的评估过多依赖客观指标,比如援助是否提高了收入、推动了就业和增加儿童入学率等。这种评估援助有效性的方式可能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忽视了受援国的主体性,援助国提供了大量并非受援国所需或急需的援助项目,导致援助资源错置或浪费。二是过于侧重援助的短期效应,忽视了援助项目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援助项目本身可能产生意外后果,而这种间接的影响很难通过项目评估直接发现。对外援助项目也可能通过影响其他复杂的社会因素影响经济发展。三是过于聚焦援助效果的经济维度,忽视了援助可能影响受援国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外来援助和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

中国对援助项目的评估体系目前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中国政府并不像西方援助主体一样去评估援助项目的效果。既有研究较少看到对中国援助项目具体效果的系统评估。考虑到前文提到的中国援助相较于西方援助的独特性,笔者认为中国援助可能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影响,也可能通过影响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继而塑造民众的发展政策偏好和对本国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知。由是观之,中国援助项目也可能影响到当地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如果援助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实质性的积极影响,民众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的评价将会更为积极。新的地理信息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方法的进步有助于我们研究上述问题。

三 数据、变量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和变量

得益于近年来地理信息数据开发和分析技术的进步,对中国援助和受援国发展的研究已经从早期的宏观研究演变到微观分析。本文以非洲国家为分析对象,利用两份最新公开的地理信息数据剖析中国援助项目对非洲国家绩效合法性的影响:一是“援助数据”,二是“非洲晴雨表”社会调查数据。② 两个数据集使用相同的地理信息编码

① William Easterly,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Teresa Hayter, *Aid as Imperialis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1;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8 期,第 135—155 页。

② 根据结果变量,本文选择第二轮“非洲晴雨表”调查数据。此次调查涵盖 16 个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加纳、肯尼亚、莱索托、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佛得角、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方法,研究者可以根据准确的地理信息将其进行匹配并展开分析。

1.绩效合法性

政府的经济领导与管理能力不足是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如前所述,绩效合法性是指一国民众对政府领导经济、管理经济和发展经济的能力与绩效的认可度。本文对非洲国家绩效合法性的测量来自“非洲晴雨表”调查数据。“非洲晴雨表”调查采用随机方式对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和治理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科学调查,其因较高的数据质量、较广的地理覆盖范围和较长的持续性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① “非洲晴雨表”在 2018 年公布了被访者的地理信息数据以供学术研究。因为笔者关注的研究问题只在第二轮调研中有清晰描述,所以本文使用的即为带有地理信息的第二轮调查数据。② 第二轮调查问卷中的第 45 个问题为:“你如何评价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受访者可以选择“很差”“差”“好”“很好”和“不清楚/没听说过”。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较好地捕捉了民众对政府领导经济、管理经济和发展经济的能力与绩效的认可度,本文使用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测量政府绩效合法性。

在“非洲晴雨表”地理信息数据中,每一个受访者都被编码到特定的地理集群(cluster)中,④因此一个地理集群可能包括多个受访者(样本中每个地理位置集群平均包含 9.4 个受访者)。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本文的样本选择已排除两类样本:一是没有明确地理信息(即经纬度)的受访者样本,二是受访者地理信息的准确度(precision level)大于 2 的受访者样本。⑤ 通过筛选,符合上述条件的地理位置集群为 1976 个,包含 13129 名受访者样本(如图 3)。

2.中国援助项目

中国援助项目的地理信息数据建立在“全球中国官方资金数据集(Global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Dataset)”基础上,“援助数据”对这些项目的地址进行了地理信息编

---

① “非洲晴雨表”目前已完成八轮调查并公布了前七轮调查的数据。对“非洲晴雨表”调查的详细说明,参见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surveys-and-methods,访问时间:2021 年 10 月 5 日。

② 第二轮调查的完成时间为 2002—2004 年,不同国家有所差异。2002 年完成调查的国家为佛得角、加纳、马里、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和乌干达,共计 6 个。2003 年完成调查的国家为博茨瓦纳、肯尼亚、莱索托、马拉维、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南非、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共计 9 个。2004 年完成调查的国家为津巴布韦。

③ 参见 Afrobarometer Data, Round 2, 2003/04, http://www.afrobarometer.org,访问时间:2021 年 5 月 25 日。

④ “非洲晴雨表”地理信息数据需要通过平台申请获取,参见 https://afrobarometer.org/data/geocoded-data,访问时间:2021 年 5 月 1 日。

⑤ 地理信息的准确度一共分为 8 种,数值越大,表示位置越不确定,数值在 2 以下则表示位置的误差不超过 25 千米。参见 Daniel Strandow, et al., “The UCDP and AidData Codebook on Georeferencing Aid, Version 1.1,” https://www.aiddata.org/publications/the-ucdp-and-aiddata-codebook-on-georeferencing-aid-version-1-1,访问时间:2021 年 5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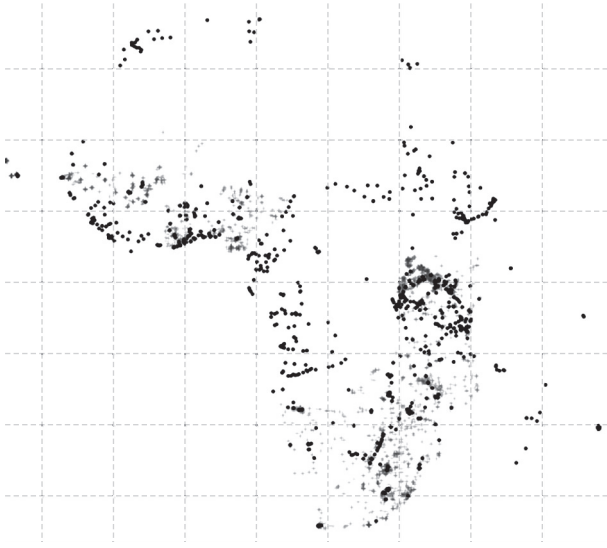

图 3　受访者和援助项目位置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制作。原始数据参见 Richard Bluhm, et al., "AidData's Geocoded Global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Version 1.0.1," https://www.aiddata.org/data/geocoded-chinese-global-official-finance-dataset,访问时间:2021 年 10 月 1 日;"Geocoded Data," https://afrobarometer.org/data/geocoded-data,访问时间:2021 年 5 月 1 日。

注:图中黑色"●"为援助项目位置,灰色"+"为受访者位置,虚线为经纬度。

码。该数据集采用"追踪被低报的资金流(TUFF)"方法,利用援助国、受援国或媒体公开数据追踪援助项目资金的去向。① "援助数据"将中国援助项目根据援助动机归为三种类型:官方发展援助项目、其他官方援助项目和模糊性官方援助项目。中国援助绝大部分可界定为经合组织中的发展援助。②

本文使用 2000—2014 年的"援助数据",该数据集包含 6190 个中国对全球的援助项目,对非援助项目总数为 3391 个(占 54.8%)。③ 每个援助项目包括援助目的、资金规模、项目类型、项目位置和项目时间等信息。该地理信息数据已被广泛用于中国对

① Austin M. Strange, et al., "Tracking Underreported Financial Flows: China's Development Finance and the Aid-Conflict Nexus Revisited," pp.935-963.

② 在 2000—2014 年的中国援助数据集中,发展援助项目占 69.71%,其他官方援助项目占 18.42%,模糊性官方援助项目占 11.87%。

③ 2021 年"援助数据"进行了一次更新。不带地理信息的项目数据可用时间为 2000—2017 年,但带有地理信息的援助项目数据并没有更新,目前可用数据依然为 2000—2014 年。此外,考虑到需要对"援助数据"和"非洲晴雨表"数据进行匹配,2000—2014 年的援助项目数据是更合适的选择。

外援助的实证研究。同其他数据集一样,“援助数据”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援助金额缺失值较多和部分项目金额高估等。本文主要利用“援助数据”中两类相对比较准确的信息:援助项目的时间和地理位置。援助项目包含具体的经纬度信息。本文对援助项目的地理信息数据做了进一步处理。首先,保留“非洲晴雨表”第二轮调查所涵盖的 16 个非洲国家中的项目。其次,删除了缺少地理信息数据的项目。最后,与“非洲晴雨表”数据一致,仅保存地理信息准确度为 1 和 2 的援助项目。通过数据筛选,本文最终得到 825 个援助项目样本。本文通过地理位置将上述两个数据集进行了匹配,计算出“非洲晴雨表”受访者到中国援助项目的最近距离。理论上,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中国援助项目的存在的受访者更可能感受到援助项目带来的变化。换言之,在中国援助项目附近的民众对项目的效果有更直接感受。

(二)“候选名单控制设计”

评估援助项目对当地发展影响的传统做法是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援助项目和受援国经济发展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和贫困率)的关系,有时辅助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因果识别。① 由于跨国数据的固有缺陷,加上援助流向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国家层面的可靠统计数据,使用跨国数据分析援助影响较为困难。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使用微观地理信息或空间数据(spatial data)分析经济发展问题。② 但即便如此,对援助项目和政府绩效合法性间的关系进行因果识别依然具有挑战性。

传统估计方法难以识别中国援助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影响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非洲晴雨表”并非面板数据(且每轮调查问题并不相同),因此无法使用面板数据方法;二是援助项目选址本身并非随机分配,项目最终落地可能受到援助国、受援国政府和援助执行机构的多重影响。③ 援助项目也并不像“撒胡椒面”一样在受援国随机分布。因此,在国家层面直接将援助项目和经济发展进行关联可能因存在选择性偏误而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

① Craig Burnside and David Dollar, “Aid, Policies, and Growth,” pp.847-868; Axel Dreher, et al., “Aid, China,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 pp.135-174.

② Stelios Michalopoulos and Elias Papaioannou, “Spatial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A Meso Approach,”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10, No.1, 2018, pp.383-410.

③ 对中国援助分配的较新的研究成果,参见黄振乾:《中国援助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对 21 世纪中国援非项目的空间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9 期,第 102—127 页;Tang Keyi, “Development Finance and Distributive Politics: Comparing Chinese and World Bank Fina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king Paper, No.2021/45, Washington, D.C.: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21;潘心如:《效率优先还是政治至上?中国对非援助次国家分配逻辑》,第十四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中国援助理论与实证创新工作坊”会议论文,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21 年 7 月 5 日。

为处理上述问题,特别是对援助项目区位选择的主观偏好进行控制,本文引入“候选名单控制设计(waiting-list control design)”方法来探索中国援助项目与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候选名单控制设计”可以理解为一种准实验法,它最早被用于医学或行为科学研究。① 近几年这种方法开始被用于对援助项目效果评估的定量分析中。② 在对外援助的实证研究中,由于研究者无法了解或缺乏足够信息了解援助国和援助项目分配者的动机,不同年份和不同区域的对外援助选址难以进行有效控制。比如中国援助项目可能更偏好政府绩效合法性高的非洲地区,这就可能存在逆向因果问题。“候选名单控制设计”能有效处理这一内生性问题,并且进一步控制援助项目分配的选择性。③

根据“候选名单控制设计”方法,本文将“非洲晴雨表”的研究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非洲晴雨表”第二轮调查开始时已有中国援助项目的地区的受访者(处理组),另一组是“非洲晴雨表”调查开始时尚未获得中国援助项目,但之后得到援助项目的地区的受访者(控制组)。既不属于处理组也不属于控制组的样本为参照组。④ 将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对比,考察两组样本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是否存在显著不同,从而获得中国援助项目和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估计策略克服了中国援助项目选址可能存在的选择性误差,实现了对处理组和控制组所在地区干扰变量的有效控制。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将对比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据此,本文设定如下分析模型:

$$legitimacy_{ivt} = \beta_1 active20_{it} + \beta_2 inactive20_{it} + \alpha_s + \delta_t + \gamma X_{it} + \varepsilon_{ivt}$$

---

① 在这种实验设计中,已经参加实验的处理组将和尚未参加实验(但即将参加实验)的控制组(而不是随机组)进行比较,从而通过控制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同质性来提升因果估计的有效性。对此方法的探讨参见 John Cunningham, Kypros Kypri and Jim McCambridge, “Explorator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a Waiting List Control Design,” *BMC Med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Vol.13, No.1, 2013, p.150; S. A. Elliott and J. S. L. Brown, “What Are We Doing to Waiting List Control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Vol.40, No.9, 2002, pp.1047-1052; Nathan Azrin and Alan L. Peterson, “Treatment of Tourette Syndrome by Habit Reversal: A Waiting-List Control Group Comparison,” *Behavior Therapy*, Vol.21, No.3, 1990, pp.305-318。

② 与传统双重差分法不同,该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空间和时间组合来尽量保证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相似性。其适用对象往往不是面板数据,它无法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和其他假设,因此也被称为“空间双重差分法”。代表性研究参见 Ann-Sofie Isaksson, “Chinese Aid and Local Ethnic Identification,” pp.833-852; Ann-Sofie Isaksson and Andreas Kotsadam, “Chinese Aid and Local Corruption,” pp.146-159; Ann-Sofie Isaksson and Andreas Kotsadam, “Racing to the Bottom?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Trade Union Involvement in Africa,” pp.284-298。

③ 一个核心假设是援助分配偏好在一定时间内相对一致。

④ 对参照组的说明详见下文。

其中，$legitimacy_{ivt}$是结果变量，表示 t 年 v 地理集群中受访者 i 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结果变量编码为二分变量，“很差”和“差”为 0，“好”和“很好”为 1。① γX_{it} 为主要的控制变量，模型中控制了年龄、性别、城市和教育等受访者的个体特征。δ_t 为时间固定效应（年）。② α_s 为地区（相当于区或县）的空间固定效应（样本中共有 455 个地区单元）。ε_{ivt}为标准误，标准误聚类在调查单位（survey cluster）。为便于对结果进行阐释，主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同时也汇报其他模型结果。

观察组 $active20_{it}$为二分变量，表示受访者 i 在时间点 t 是否居住在中国援助项目附近。$inactive20_{it}$也是二分变量，表示受访者 i 的居住地附近在时间点 t 没有援助项目，但 2014 年前有中国的援助项目流入。调研之前已经存在的中国援助项目样本数为 106 个，调研之后才出现的项目样本数量为 719 个。③ β_1 捕捉处理组的受访者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β_2 捕捉控制组的受访者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本研究用两组受访者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的差值（$\beta_1-\beta_2$）及其方向来估计援助项目对受援国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

本文在基础模型中采用 20 千米距离作为受访者是否感受到中国援助项目的界限。active20 表示受访者方圆 20 千米范围内至少有一个中国援助项目（处理组）；inactive20 表示受访者方圆 20 千米范围内在调查开始的时间点没有中国的援助项目，但 2014 年前将有中国援助项目进入（控制组）。为防止同一个援助项目被编码两次，将“非洲晴雨表”调查开始前 20 千米范围内已经有中国援助项目且调查后 20 千米范围内也有中国援助项目的样本编码为处理组。

本文以甲地为例对“候选名单控制设计”的具体操作方法做进一步说明（如图 4）。图 4 中甲地共有 20 个中国援助项目样本。甲地“非洲晴雨表”第二轮调查于 2003 年进行。在 20 个中国援助项目中，有 8 个项目在调查开始前已进入甲地，12 个中国援助项目在调查前未进入，但在之后进入甲地。使用“候选名单控制设计”，如果在“非洲晴雨表”调查开始时受访者 20 千米范围内已有援助项目进入（如 2003 年），则将此类受访者标记为处理组（A）；如果在调查开始时受访者 20 千米范围内尚无援助项目，但调查结束后有援助项目进入（如 2005 年），则将此类受访者标记为控制组（B）；“非

① 在研究样本中剔除了回答为“不知道/不太了解”的样本，这部分样本约占所有选项的 8%（8.01）。在稳健性检验中保存了完整的答案（1—4），并进行了定序变量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见表 2）。

②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时间固定效应针对的是“非洲晴雨表”调查的时间，并非援助的时间。“非洲晴雨表”在不同的国家调查时间并非一致，分别为 2002 年、2003 年和 2004 年。

③ “非洲晴雨表”第二轮调查的时间在 2003—2004 年，每个国家的时间不一定相同，本文对每个国家进行了时间先后的识别。此外，如果调查时间和中国援助项目发生在同一年，则将其视为已经存在（正在实行）的项目。

洲晴雨表”调查前后,受访者 20 千米范围内不存在援助项目,则该类受访者标记为参照组(C);调查前后,受访者 20 千米范围内都有援助项目进入的样本,亦标记为处理组(A)。表 1 为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情况。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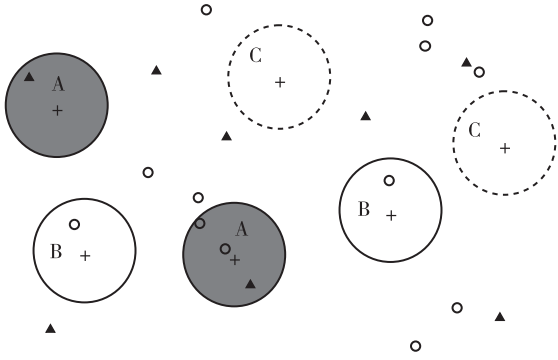

图 4 “候选名单控制设计”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示受访者位置,“▲”为调研开始前已存在的援助项目,“○”为调研结束后才进入的援助项目,外围圆圈表示受访者 20 千米范围。灰色圆圈为处理组样本,白色实线圆圈为控制组样本,白色虚线圆圈为参照组样本。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绩效合法性(二分变量)	12075	0.561	0.496	0	1
绩效合法性(定序变量)	12075	2.487	0.886	1	4
active20	13129	0.139	0.346	0	1
inactive20	13129	0.313	0.464	0	1
active25	13129	0.149	0.356	0	1
inactive25	13129	0.350	0.477	0	1
active30	13129	0.157	0.363	0	1
inactive30	13129	0.388	0.487	0	1
active35	13129	0.163	0.370	0	1
inactive35	13129	0.434	0.496	0	1
active40	13129	0.175	0.380	0	1

① 25 千米、30 千米、35 千米、40 千米和 50 千米的编码方式和 20 千米的编码原则一致。下文将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

续表 1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active40	13129	0.468	0.499	0	1
active50	13129	0.190	0.393	0	1
inactive50	13129	0.517	0.500	0	1
年龄	13129	28.150	7.418	18	66
性别	13129	1.452	0.498	1	2
城市	13129	1.734	0.442	1	2
教育	13129	6.357	1.442	0	9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　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中国援助提高了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

表 2 汇报了基础模型的分析结果。基础模型中的因变量为二分变量(模型 1),控制了受访者的主要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城市和教育),并对地区和年份分别做了固定效应处理。通过计算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系数差值($\beta_1-\beta_2$)并用 F 检验来测定两者的差值是否有统计学的显著意义。

研究发现中国援助项目显著提高了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与控制组相比,处理组的受访者对当地政府管理经济绩效持更加正面的评价(模型 1)。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系数差值为 0.1,F 检验达到统计学的显著意义($P=0.003$),并且处理组的系数为显著正相关(0.069),而控制组的系数为显著负相关(-0.032)。这意味着在获得中国援助项目的非洲地区,民众认为政府绩效合法性更高。与之相比,在有待获得中国援助项目的地区,民众认为政府绩效合法性更低(甚至是负面的)。简言之,在获得中国援助项目之后,当地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从援助到来前的负面评价转为积极评价。在模型 1 的控制变量中,城市为正相关且显著,说明非洲的城市居民比起农村居民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更高一些。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为逻辑回归模型(Logit)和定序逻辑回归(Ordered Logit)的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和 OLS 模型一致。

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援助项目对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的提升有实质性意义。通过计算可知,模型 1 中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系数差值为 0.1。可推知与附近无中国援助

表 2 中国援助项目对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

	OLS	Logit	Ordered Logit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active20	0.069*** (0.025)	0.347*** (0.123)	0.240*** (0.091)
inactive20	−0.032* (0.016)	−0.167** (0.084)	−0.163** (0.071)
年龄	−0.001 (0.001)	−0.006 (0.004)	−0.003 (0.004)
性别	0.005 (0.012)	0.026 (0.057)	−0.016 (0.052)
教育	0.000 (0.006)	−0.0004 (0.030)	−0.013 (0.025)
城市	0.026** (0.013)	0.139** (0.068)	0.012 (0.059)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2075	12040	12075
差值	0.100	0.514	0.403
F 检验	8.460	8.420	8.550
P 值	0.003***	0.003***	0.003***
R^2/*Pseudo* R^2	0.193	0.100	0.15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单位聚类标准误;模型 1 取 R^2,模型 2 和模型 3 取 *Pseudo* R^2;为节省空间和格式对称,略去模型 1 的常数项结果和模型 3 的截点结果(不影响研究发现)。*** $p<0.01$, ** $p<0.05$, * $p<0.1$。

项目(援助项目待入)的民众相比,附近(20 千米范围内)有中国援助项目的民众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要高出 10%(如图 5)。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证上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中国援助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显著影响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

一是改变援助时间的安慰剂检验。为确保当地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

的变化是中国援助项目带来的,而非由其他政策或是偶然因素所引发,本文更改援助时间进行安慰剂检验。在安慰剂检验的设定中,假设接受援助项目的时间提前一年,构造出援助时间的虚拟变量。表 3 显示,使用三种不同的模型的 *P* 值均不显著,说明当地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的变化在中国援助项目到来前尚未发生,仅发生在援助项目到来后,这有力证实了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影响的稳健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安慰剂检验

	OLS	Logit	Ordered Logit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active20	0.037* (0.019)	0.187* (0.097)	0.086 (0.068)
inactive20	0.080 (0.062)	0.363 (0.264)	0.283 (0.324)
年龄	-0.001 (0.001)	-0.006 (0.006)	-0.003 (0.004)
性别	0.004 (0.011)	0.022 (0.054)	-0.020 (0.048)
教育	0.0004 (0.009)	0.001 (0.049)	-0.013 (0.033)
城市	0.027** (0.013)	0.146** (0.066)	0.019 (0.053)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2075	12040	12075
差值	-0.043	-0.176	-0.196
F 检验	0.500	0.460	0.390
P 值	0.482	0.497	0.533
R^2/*Pseudo* R^2	0.193	0.152	0.10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单位聚类标准误;模型 1 取 R^2,模型 2 和模型 3 取 *Pseudo* R^2;为节省空间和格式对称,略去模型 1 的常数项结果和模型 3 的截点结果(不影响研究发现)。*** $p<0.01$, ** $p<0.05$, * $p<0.1$。

二是对中国援助项目产生影响的地理范围的稳健性检验。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会受到地理距离的限制。在离中国援助项目越近的地区,居

民越可能受其影响;而在距离援助项目越远的地区,居民越难或甚至无法感受到中国援助项目的存在。有研究发现援助项目显著减少了尼日利亚婴儿死亡率,但这种作用的地理范围不超过方圆 50 千米。① 中国援助对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的影响超过一定距离后将可能不再起显著作用。本文将中国援助项目以方圆 25 千米、30 千米、35 千米、40 千米和 50 千米距离为截距来检验援助项目的溢出效应范围。表 4 显示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的影响介于 35 千米和 40 千米之间,超过 40 千米就不再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意义(模型 1 到模型 5)。显著性水平也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而变小:从模型 1(25 千米)的 1%显著性水平下降到模型 3(35 千米)的 5%显著性水平。处理组和控制组系数的差值也逐渐下降,从模型 1 的 0.125 下降到模型 5 的 0.051。这表明距离中国援助项目越远,援助项目的效果作用越不明显,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也不再有显著差异。为直观展示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随地理距离变化的情况,本文计算了不同地理距离处理组和控制组下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影响的边际效应(如图 5),超过 40 千米之后,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再有显著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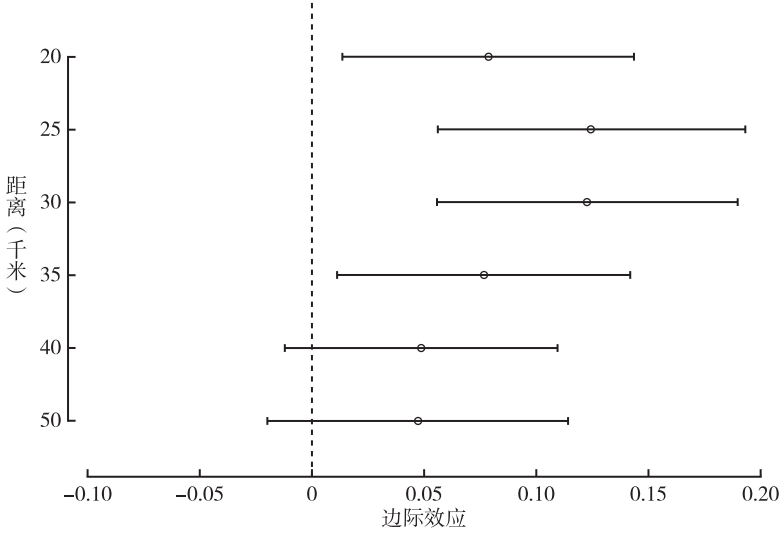

图 5　地理距离与政府绩效合法性:中国援助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边际效应为处理组系数减去控制组的系数,取 95%的置信区间。

① Andreas Kotsadam, et al., "Development Aid and Infant Mortality: 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Nigeria," *World Development*, Vol.105, 2018, pp.59-69.

表 4　稳健性检验:地理距离、项目规模和其他

	地理距离(千米)					项目规模	项目时间	经济危机	地区—时间双固定	地理位置准确度
	25	30	35	40	50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active20						0.058* (0.030)	0.097** (0.043)	0.064** (0.026)	0.069*** (0.025)	0.080*** (0.024)
inactive20						−0.031* (0.016)	−0.055 (0.050)	−0.021 (0.020)	−0.032* (0.016)	−0.033** (0.016)
volume						0.000 (0.003)				
implementation							−0.000 (0.000)			
active25	0.095*** (0.025)									
inactive25	−0.030* (0.016)									
active30		0.086*** (0.024)								
inactive30		−0.037** (0.015)								
active35			0.057** (0.024)							
inactive35			−0.020 (0.015)							

续表 4

	地理距离(千米)					项目规模	项目时间	经济危机	地区—时间双固定	地理位置准确度
	25	30	35	40	50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active40				0.037 (0.026)						
inactive40				−0.015 (0.015)						
active50					0.028 (0.026)					
inactive50					−0.019 (0.01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时间双固定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样本量	12075	12075	12075	12075	12075	7732	3927	12075	12075	11895
差值	0.125	0.123	0.076	0.051	0.047	0.089	0.152	0.084	0.100	0.114
F 检验	12.79	12.94	5.29	2.33	1.89	6.579	3.312	4.486	8.468	10.92
P 值	0.0003***	0.0003***	0.02**	0.127	0.169	0.0154**	0.0813*	0.0344**	0.00367**	0.00097***
R^2	0.194	0.194	0.193	0.193	0.193	0.234	0.137	0.193	0.193	0.19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单位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城市和教育;由于样本量限制,项目规模和执行时间无法进行同时控制。*** $p<0.01$, ** $p<0.05$, * $p<0.1$。

三是控制中国援助项目规模和项目完成时间。中国援助项目的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最大项目援助金额为 16 亿美元,最小项目援助金额为 2632 美元。本文对援助金额进行了控制(取自然对数),虽然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结果依然稳健(见表 4 模型 6)。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包括一些基建项目)的执行过程有“中国速度”之称,用来赞美中国项目的建设速度和效率。在分析样本中,中国援助从项目开始到项目结束的平均时间为 552 天,最长时间为 1092 天。对项目执行时间进行控制之后(取自然对数),研究发现依旧成立(见表 4 模型 7)。①

四是控制中国援助项目的规模变化。21 世纪初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大幅提升,并且这种积极的对外援助政策一直持续至今。因此,中国 21 世纪的援助政策有很强的延续性和持续性。但对非援助项目在 2008 年之后曾出现过波动,样本中的援助项目从 2007 年的 276 个降为 2008 年的 198 个。国际金融危机是否对中国对非援助政策产生影响?中国对非援助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政策导向变化,从而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也随之变化?为此,本文以 2007 年为分界点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08 年之前的援助项目对非洲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和 2000—2014 年的样本的统计结果一致(见表 4 模型 8)。这表明,中国援助项目对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稳定且持续。这一结果也符合中国对外援助政策走向,事实上,在进入 21 世纪后至数据截止的 2014 年,中国对外援助战略没有根本变化。

五是采用地区—时间双固定模型和控制“非洲晴雨表”数据准确度。在主要模型中,本文同时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检验了地区—时间双固定模型,结果依然保持稳定(见表 4 模型 9)。在主要的回归分析中,本文“非洲晴雨表”数据的地理位置准确度取值范围在 25 千米之内(位置准确度取值 1 和 2)。将“非洲晴雨表”调查数据的准确度取值只保留有确切位置的样本(位置准确度取值 1),研究结果不变(见表 4 模型 10)。

(三)异质性分析

援助项目的异质性可能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产生差异性影响,不同类型的援助项目的不同动机(intent)和不同援助部门(sector)都可能带来不同的影响。在本文分析涵盖的 825 个中国援助项目样本中,有 652 个项目为官方发展援助,占79.03%;其他官方援助项目数量为 89 个,占 10.79%;模糊性官方援助项目数量为 84 个,占10.18%。依照数据特征将援助的动机进行分类分析,发现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

① 由于项目援助金额和执行时间的样本量缺失,匹配后同时包含援助金额和项目执行时间信息的样本量有限,无法进行同时控制。

的影响主要来自官方发展援助类项目,其他官方援助项目和模糊性官方援助项目与受援国政府绩效合法性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见表 5)。

表 5 不同援助类型与绩效合法性

	官方发展援助	其他官方援助	模糊性官方援助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active20	0.082*** (0.025)	−0.004 (0.010)	0.092*** (0.004)
inactive20	−0.058** (0.024)	0.011 (0.014)	0.019 (0.0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7974	1906	2195
差值	0.139	−0.015	0.073
F 检验	11.220	2.512	3.644
P 值	0.001***	0.254	0.196
R^2	0.183	0.339	0.09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单位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城市和教育;*** p<0.01,** p<0.05,* p<0.1。

“援助数据”根据经合组织对援助部门的分类方法,将中国援助也分为不同的部门(见表 6)。本文逐一将不同援助部门的项目和“非洲晴雨表”数据集进行匹配,根据援助部门样本分别对援助项目和经济绩效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健康项目更可能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变化产生显著影响,其他援助部门并不显著(见表 7)。

表 6 援助部门样本

援助部门	规模	占比(100%)
教育	108	13.09
健康	190	23.03
政府与社会组织	66	8.00
其他社会设施与服务	61	7.00
能源生产与供应	36	4.36

续表 6

援助部门	规模	占比(100%)
工业、矿产与建设	12	1.45
通信	157	19.03
交通与储藏	97	11.76
水资源供应与清洁	51	6.18
总数	778	93.3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中仅列出主要的援助部门,其他援助部门(如农业、林业和渔业援助等)因和“非洲晴雨表”数据匹配后样本量缺失或样本过小,未列入其中。

本文认为受到可供分析的样本限制,应谨慎解读该结果。将中国援助项目样本进行分解之后,部分援助样本显著减少,如工业、矿产与建设援助部门项目仅为 12 个(见表 6),与“非洲晴雨表”数据匹配后形成的分析样本大为减少,如教育部门项目为 335 个,通信部门项目仅为 266 个。加之“非洲晴雨表”数据聚类在调查地理单位,匹配后的样本再进行处理组和控制组二次分解(援助部门的水资源供应与卫生项目因样本量太少导致最终匹配样本缺失),可能因为大样本缺失导致回归偏误,因此本文认为对援助部门异质性的检验结果需谨慎,此分析结果仅供参考。

(四)影响渠道讨论

民众对政府领导、能力和政策的评价与民意偏好差异可能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① 非洲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差异也可能有多方面原因。限于所用数据的特点,本文不可能对中国援助和政府绩效合法性的中间机制进行全面检验。尽管如此,本文根据最近的相关研究发现和“非洲晴雨表”调查数据的信息对可能的影响渠道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理论上,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和个体层面的生活水平提升都可能影响政府绩效合法性:国家发展越好、个体生活水平越高,则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越高(如图 3)。通过选取“非洲晴雨表”相关变量,本文分别考察受访者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对国家经济状态的认知)和受访者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感知(个人生活水平、财政状

① Michael Tomz and Jessica Weeks,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Electoral Interven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14, No.3, 2020, pp.856-873; Benjamin Goldsmith and Yusaku Horiuchi, “In Search of Soft Power Does Foreign Public Opinion Matter for US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64, No.3, 2012, pp.555-585.

表 7 不同援助部门与政府绩效合法性

	教育	健康	政府与社会组织	其他社会设施与服务	能源生产与供应	工业、矿产与建设	通信	交通与储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active20	0.033 (0.074)	0.101** (0.042)	0.026 (0.034)	0.124 (0.124)	−0.069 (0.072)	−0.062 (0.051)	0.037 (0.044)	0.046 (0.059)
inactive20	0.122*** (0.013)	−0.051 (0.039)	−0.016 (0.039)	0.034 (0.093)	−0.020 (0.028)	−0.029 (0.005)	−0.152 (0.134)	−0.021 (0.0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5	2852	1984	1312	1320	1214	266	1849
差值	−0.088	0.152	0.041	0.090	−0.049	−0.032	0.189	0.067
F 检验	1.837	4.561	0.798	0.188	0.455	0.506	1.135	1.393
P 值	0.247	0.044**	0.401	0.694	0.569	0.606	0.480	0.268
R^2	0.185	0.142	0.181	0.121	0.204	0.140	0.321	0.11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单位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城市和教育;援助部门的水资源供应与卫生项目处理组样本缺失;*** p<0.01, ** p<0.05, * p<0.1。

况和工作机会)两类变量。① 研究表明,中国援助项目对受访者个人经济状况提升(处理组和控制组相对照)未产生显著影响(见表 8 模型 2 到模型 4),但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评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处理组样本的受访者对国家经济的信心显著高于控制组的受访者(见表 8 模型 1)。这说明居住在中国援助项目附近的民众与控制组相比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更强,而更强的经济发展信心意味着对政府绩效合法性有更高的评价。

表 8 影响渠道分析

	国家经济状况	个人生活水平	个人财政状况	个人工作机会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active20	0.101* (0.060)	0.089 (0.068)	0.042 (0.064)	0.069** (0.029)

① “非洲晴雨表”是问卷调查,并不存在有关受访者的客观经济社会状况的数据,变量来自本文分析所用的“非洲晴雨表”数据集,将上述变量进行二分变量赋值,所用模型依然为基础模型。囿于篇幅,具体变量操作过程未列出。

续表 8

	国家经济状况	个人生活水平	个人财政状况	个人工作机会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inactive20	−0.065 (0.042)	−0.006 (0.044)	0.122*** (0.040)	0.059*** (0.01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2807	13061	11850	13044
差值	0.167	0.094	−0.080	0.009
F 检验	3.666	1.116	0.864	0.055
P 值	0.055*	0.291	0.353	0.814
R^2	0.172	0.083	0.123	0.12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单位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城市和教育;*** p<0.01,** p<0.05,* p<0.1。

这一结果与国外经济学家最新研究发现基本一致且能相互佐证,研究表明中国援助项目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无论是国家总体经济增长还是国家内部的地区经济发展。① 中国学者的研究也显示中国援助有“点亮非洲”的积极作用。② 渠道分析和这些研究进一步表明,中国援助项目对受援国产生的积极经济影响鼓舞了当地民众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从而提升了他们对本国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综合现有文献和本部分的渠道分析,本文认为中国援助项目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的理论关联是真实存在的,但更深入的探讨还需更加精细的数据开发。

(五)中西援助对受援国绩效合法性的影响差异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新兴的“南南援助”的代表,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则属于传统的“北南援助”。中国援助和传统西方援助经常被研究者进行对比。正如前文分析所示,两种援助具有不同的逻辑和特征。对本研究的一个合理质疑

① Axel Dreher, et al., “Aid, China,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 pp.135-174; Axel Dreher, et al., “Is Favoritism a Threat to Chinese Aid Effectiveness? A Subnational Analysi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5750X20304186,访问时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

② 徐志成、张宇:《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载《经济学(季刊)》,2021 年第 5 期,第 1499—1519 页。

即西方援助也能提升民众对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如果两者效果是相似的,中国援助项目的有效性并无独特意义与价值。为比较两种援助在受援国绩效合法性上的作用差异,本文将中国援助项目和同时期西方的援助项目进行了对比。西方援助体系有不同的主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世界银行主导的援助项目。因此,选择世界银行援助项目和中国援助项目比较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并且“援助数据”也提供了同时期世界银行援助非洲项目的地理信息数据,两种援助的可比性很高。本文用同样的方法和模型对世界银行 2000—2014 年“非洲晴雨表”所涵盖的 16 个非洲国家中 2383 个世界银行援助项目进行了统计分析。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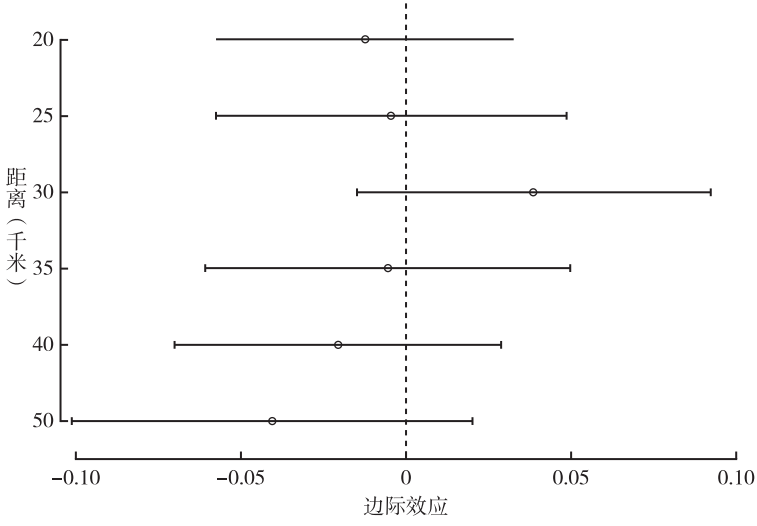

图 6　地理距离与绩效合法性:世界银行援助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边际效应为处理组系数减去控制组的系数,取 95%的置信区间。

研究表明,世界银行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如图 6)。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值非常小且在不同地理范围内(20—50 千米)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在世界银行援助项目附近的非洲民众和居住在没有世界银行援助项目(待入)地区的非洲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没有明显不同,甚至处理组的受访者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还低于控制组的受访者(差值为负值)。这表明,世界银行援助到来前后,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没有得到显著改善,西方援助没有提升

① 本文用同样的方法对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进行了筛选,2383 是纳入分析中的援助项目总数。

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由此看来,与世界银行援助项目相比,中国援助项目对提升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的作用更为明显。

五　结论

随着作为新兴国家代表的中国不断融入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外援助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并且伴随从未停歇的世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纷争以及世界大国的竞相投入,对外援助领域成为“不见硝烟的战场”。2021年中国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中国未来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特别是国际发展合作和援助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中国和全球发展都很重要。由此,科学认识中国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并对其进行正确评估十分必要而迫切。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系统性实证研究与国际学界相比仍显滞后。虽然作为“南南援助”代表的中国援助相较于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北南援助”的独特性已有较多总结和解读,但中西援助因彼此差异而对受援国带来影响的实证探索方兴未艾。以往对援助有效性的关注侧重客观指标(如经济增长),忽视援助有效性的因果关系复杂性,并且较少关注援助对受援国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此外,现有对中国援助有效性的研究多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对受援地区的次国家微观分析亦有限。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项目的地理信息数据,将其和“非洲晴雨表”地理信息数据进行匹配,引入“候选名单控制设计”检验了中国援助项目与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关系并尝试分析了中间的影响机制。

研究表明中国援助项目显著提升了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中国援助到来后,非洲民众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从此前的负面评价转为积极评价。这种独特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援助项目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并提振了当地民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与之相比,来自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援助在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这个重要维度上显著优于西方援助。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分析对外援助的有效性是近两年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的重要进展,但相较既有研究,本文更加关注援助项目对受援国国内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对理解中国援助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对中国援助实践的理论提炼与实证分析还有广阔空间。本文揭示了中国援助和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间一种可能的联系与影响路径,有助于理解中国对外援助的特质及其全球政治经济意义。

(截稿:2022年2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